

# “看见”义视觉动词的语义地图构建

## 文献综述

### 引言

跨语言中表示“看见”义的核心视觉动词非常丰富，汉语中的“见”、英语中的“see”、韩语中的“보”、日语中的“見て”、因纽特语中的“C d -”，而“看见”义也在各语言中最基础最常使用，属于基本层次范畴中的词汇，在历时发展中也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引申义，变成一个多义词，孤立语、屈折语、黏着语、复综语均如此。那么跨语言中该类词汇的各个义项之间的关系具体如何？是否存在远近之分？若存在那么各语言的内部联系是否一致，这又是否印证着“看见”义动词在我们人类大脑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概念空间？本文将以汉语、英语、日语为例，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分别梳理核心视觉动词的各个义项，尝试构建“看见”义视觉动词的语义地图，并从中发掘共性规律，从而为相关领域的类型学研究做出努力。

(关键词：语义地图 实词 视觉动词 义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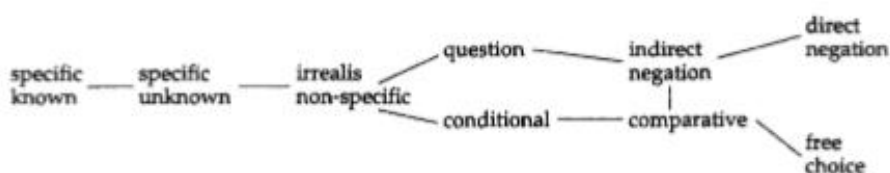
### (一) 类型学与语义地图理论

语义地图理论是语言类型学下的一个分支。语言类型学既研究语言的差异，又研究语言的共同之处。作为一门学科，它是包罗万象的。它的主题是对语言各个领域的跨语言变异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从而研究人类语言的极端情况和多种可能性；它还可以描述语言的类型并对它们进行分类。优秀的类型学家会总结出语言结构的各种约束条件，从而帮助人们在并未深入了解一种语言时就能对其具备一定的预期认知。换言之，类型学概括——前提是在高质量且可靠的资源的基础上——有助于预测在一种语言中什么更有可能发生，什么不太可能发生。理想情况下，类型学与解释相伴而行——语言为何是这样的。类型学的核心在于归纳性质的跨语言概括。在这一学科领域，我们可以试验各种各样关于语言或语言特性的理论陈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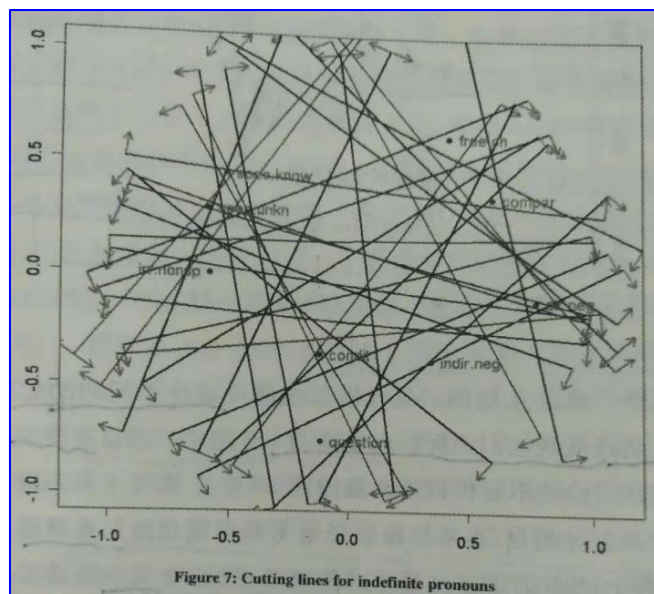
语言类型学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假设：不同语言在许多不同方面都是不同的，但这种跨语言的变异是可以进行系统研究的。它旨在揭示和理解人类语言中可用于表达各种核心概念的结构和参数的范围。因此，类型学尝试着去建立一种跨语言的概括——适用于所有或大多数人类语言，以及语言现象之间的关系。这些概括通常被称为“语言共性”。但与此同时，每种语言都有自己问问题的方式、形成命令的方式、或者表达否定的方式。这些基于更加细节性的描述的差异在跨语言中可能会表现的非常明显。因此，普遍性也往往反映了跨语言的趋势。这里就涉及到另一个概念，即“蕴含共性”。比如，如果一种语言有一个舌面高前鼻元音舌位，那么它往往也会有一个舌面低前鼻元音。这种“蕴含共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语言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甚至可以预测它可能的发展方式（毕竟他来自于一种经验性的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类型学有助于建立语言各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因为我们在语言系统的某一部分中所作的选择可能会限制在其他一些领域所作的选择。

但是，绝对的普遍性——没有任何例外——则是很少见的。大多数具有普遍价值的陈述都以普遍趋势的形式加以转换，这种趋势允许一些例外，但总体上是成立的。因此，语言类型学通过挖掘语言共性从而提供预测的最终目的，我认为依然是要提供一种解释——为什么会存在一定的语言共性和普遍趋势，这些共性和趋势的局限性可能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与许多因素相关，比如，我们人类如何交流以及如何感知周围的世界，语言如何反映社会和文化环境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语言类型学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对语言的共时语法特征的分类，类型学家是在根据语言的一般结构，而不是根据语言的历史或地理关系来进行考察的。但是历时梳理也必不可少，因为它往往为我们展示了共时层面上纷繁复杂的语言学现象之间的内部关系。总之，语言类型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种语言的共同之处（这一点上，语言类型学也与哲学密切相关），为我们预测人类语言变化的趋势，扩大我们对语言多样性的认识。那么，既然各语言在某种层面上存在着如此多的共性，这是否也意味着说着不同语言的人类的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着颇多相似之处的呢？我们可否把这种思维图式构建出来从而更好地理解语言共性呢？于是接下来就语义地图理论便应运而生。

我们知道，语言的语义类别各不相同——也就是说，语言形式所选择的语义功能或使用范围在你跨语言中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区别。然而，许多可能的语义类别并没有得到验证，而且相似的类别常常出现在不相关的语言中。这种受约束的变化模式暗示了变化背后的普遍概念基础，例如不同的语言会提供相同概念领域的不同映射。语义地图是捕捉这种思想的一种方法，它既表示假定的通用结构（整体性），也表示特定语言在该结构中凸现出来的部分。语义地图通常采用离散图结构的形式( Haspelmath 1997, 属于第一代语义地图——经典语义地图)，如下所示（这张语义地图展示了与格的一组典型语义功能，通过为特定语言划定子图，我们可以得到英语、法语、汉语等许多语言作为这个通用底图的一个连通子集的语义范围）：



继第一代语义地图后，类型学家又提出了基于连续表示的语义图(如 Croft & Poole, 2008; Cysouw 2001, 2007; 张定, 2010) 属于第二代语义地图，他将计算机建模与语义地图绘制结合起来)，如下图所示：



在这两种传统中，推断出的底层结构一般被解释为捕捉不同语义功能之间的概念相似性，它的基本原理就是“语义结构视觉代表跨语言规律”。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语义地图不一定能够完全准确地反映人类概念结构对现实的认知，它只是类型学家在表征语言共性时的一种尝试。

在形式上，语义地图的节点（第一代语义地图）表示语义功能或用途，而线条(链接)连接着紧密相关的语义功能，节点和线段两者必不可少。对于任意给定的语义地图，我们都首先假设语义变量及彼此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然后，给定语言形式的意义，它被表示为底图的一个相关区域。想要从语义地图中获取更多的语言信息，我们还需要知晓 Croft 在 2003 年提出的“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特定语言的语义类别总是会在底图中选出一个连通性子集。我们认为这一假设抓住了一种人类广泛共享的直觉，即语言的类别所表示的都是概念或感知空间当中的连接区域。基于这一假设，一旦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语义地图来适应并说明大量的跨语言数据，那么我们将会期望来自尚未检验的语言的新类别也能够从中为自己挑选出一个合适的连通子图——当然很可能是新颖的连通子图（如果原本的语义地图在接受新语料检验时出现不符合、不适用的状况，那么我们需要对该语义地图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以贴近我们头脑中的那个概念联系范式）。因此，语义地图简洁地表示了人们在给定语义域中可能会发现和可能不会发现的变化模式，而底层地图则被用来表示一个共同的人类认知模式。语义地图已被广泛应用于表示跨语言的语义变异，并取得了非常棒的效果。

但是另一方面，基于跨语言数据来构建语义地图的工作通常是手工完成的，而对于大型数据集的建模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因此，在语义地图的后续发展中出现了将这一过程自动化的情况。Croft 等人的第二代语义地图的绘制过程中，使用了计算技术(如多维缩放)从而直接从数据推断出来连续映射。研究对象也从功能词（虚词）扩展到实词、句法等多个领域；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基于实际语料构建出三维的语义地图（如：郭锐，2015）。

在绘制语义地图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细节性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是，以功能词为例，如果两个或者多个功能采用了同一种形式，我们并不是只有概念空间这一条解释路径，但对于这个问题仍然存在着温和和激进两种观点，这一问题尚未解决；二是，绘制语义地图过程中连接哪些节点不连接哪些节点，这种选择

往往是多样的，我们一方面要遵守“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另一方面也要兼顾准确率和覆盖率两个因素，既不可为了追求覆盖率而采取过于圆滑的方式从而降低准确率，也不可为了追求准确率而主观故意遗漏一部分信息从而绘制出覆盖率极低的语义地图。但无论如何，语义地图无法为我们提供对相关语言信息的解释，它只是能够为我们更直观地呈现出语言信息本身。

## （二）实词语义地图绘制问题

前述我们梳理了语言类型学与语义地图之间的内部沿革，对于语义地图理论本身的引介主要集中在基本原理、操作程序以及优缺点的讨论上，下面我们首先对理论本身的发展作以简要介绍。

语义地图理论的雏形形成于 Anderson, Lloyd B. (1982) 的一篇关于完成时态的类型学研究，他指出在跨语言比较中，我们可以尝试着绘制出一幅“适用于所有语言中全部形式-意义的大语义地图”，这一设想后续也成为了语义地图的核心概念；15年之后，类型学家 Haspelmath (1997 a, b) 以及 Stassen (1997) 出版了三部语言类型学研究的专著，Haspelmath 绘制出了不定代词的语义地图，将语义地图理论推向了类型学的舞台中央，此后语义地图理论迅速发展；进入 21 世纪后，Croft (2001,2003) 和 Haspelmath (2003) 继续深耕，后者也对第一代经典语义地图的操作范式等一系列内容做出了总结，后续学者也多以此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2007 年，在德国召开了关于语义地图的专题研讨会，出版会议论文集《Workshop on Semantic Maps》；一年后，Croft&Poole 类比了投票的空间理论和语义地图理论的相似性，将数学方法引入从而产生了 MDS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多维量表法)——第二代语义地图；同年年初，张敏教授访问北京大学时将语义地图模型介绍给国内学者，引起汉语学界热烈反响。应当说明的是，语义地图模型虽然新近才从西方引进，但其基本思路跟立足于汉语研究的中国学者的思考与探索相当一致，比如赵元任先生分析偏侧关系时使用的“图解法”，朱德熙先生由点及面地分析、预测多功能语法形式跨方言、跨时代的关联性等等；2015 年，李小凡、张敏、郭锐等编著的《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出版，内容囊括了近十多年多篇国内关于语义地图理论或宏观或微观的论文研究，分为方法引介和探讨以及个案研究两部分，该书的出版既是对国内汉语学界类型学研究发展的一大总结，同时又给予后续有志于研究语义地图理论的学者极大地帮助；后续汉语学界关于语义地图理论的研究成果也越发深入，其中，范晓蕾的《语义地图的解析度及表征方式——以“能力义为核心的语义地图”为例》和《以“许可—认识可能”之缺失论语义地图的形式和功能之细分——兼论情态类型系统之新界定》两篇文章提出了不少不乏创建性的观点，她认为，语义地图的功能节点不应该是一个死板的硬性要求的所谓“基元”，正如现代的电子地图一样，我们可以借助卫星在终端上对某一区域进行放大或缩小的操作，那么同理建立在概念空间上的语义地图也应该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依据一定的“比例尺”从而对整个地图进行放大或缩小的操作，这个“比例尺”就是作者所提出的“解析度”，放大版的语义地图能够呈现出更丰富也更冗杂的信息，而缩小版的语义地图则会呈现出更精当也更简略的信息，二者各有其研究的价值。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实际地图的比例尺是按照数字来精准计算的，非常严谨；但是解析度相对而言就比较具有主观性，我们很难保证在每一次放大或缩小的操作中，对每个基元的衡量完全是贯彻了同一个标准。当然我们还要考

虑到，在实际的语义地图绘制中，对语义或语法功能的把控是否一定需要达到像数学运算那样高的精度。

到目前为止，中外语言学界都没有专门的相应期刊来刊载相关的论文并体现这一理论的沿革，学界使用这一理论来去建构各种实词或多功能语法形式（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但是有语法意义的语言标记）的文章散见于语言学的核心期刊中。其中，中文类的期刊犹以《语文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等所收录的相关文章含金量最高；而英文类期刊则以《Linguistic Discovery》和《Linguistic Typology》两部所刊载的关于语义地图理论的文章最为丰富。。

目前对语义地图的绘制主要集中在虚词、句式等句法层面，因为语义地图理论最早提出时，研究的单位就定位在“多功能语法形式”上，而所谓的“多功能语法形式”其实就包含小品词以及一些特殊的构式，Croft 在其《激进构式语法》中便大量使用语义地图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各个构式内部的共性。这当然更是因为“多功能语法形式”往往存在多种意义/功能，而摸清楚各意义/功能之间的联系在当时语法研究中显得尤为迫切。但实际上，实词（仅限于多义词）的各个义项之间同样存在内部联系（这种关系也可被认为是特定语义场内部概念化关系），这种联系往往也具有跨语言的共性，也是可以使用语义地图来进行表征和挖掘。换言之，当我们对实词的内部概念化关系（语义衍生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时，语义地图仍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工具手段。

到目前为止，构建实词语义地图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语料有属于印欧语系的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属于南亚语系的越南语以及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日语、韩语、蒙古语等，而来自其他语言的语料相对而言较少，远不及小品词、特定句法构式的语料来源广泛，这是目前实词语义地图绘制中在所涉语言上存在的一个问题，未来仍期待有更多的语言现象加入构建，同时也应对已有的语义地图做出检验。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实词的概念空间比虚词和语法格式的概念空间复杂得多，要总结出其中的共性相当困难。原因是实词的语义演变虽然与语言共性有关，但受到的语言外部因素，如文化、习俗、地理等因素的影响更多；而虚词和语法格式的功能演变基本上有语言内部因素所决定，具有更大的共性(郭锐)。除此之外，当我们依据“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来对语义关系作出判断时，还需要对特定词汇项的历时义和共时义作出细致的区分，特别是像汉语这种有悠久发展历史的语言，在语言演变中词汇项的语义要素经历多次拆分和重组，这一过程同时与语音、语法等多个层面有关，这些都加大了实词语义地图绘制的难度。在实词语义地图的呈现上存在诸多问题，针对此学界提出了三维语义图、同词化语义图以及非位网络等诸多设想。另外，如何处理语义节点空白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Perrin (2007) 曾对属性义词做出过研究。属性义的词(一般表现为形容词)往往是多义的，如“硬”在不同语言中可能具有下面这些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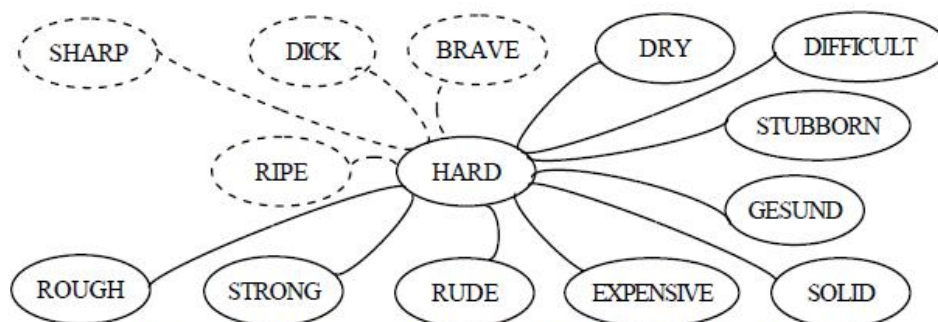


Figure 8: Polysemous patterns shared by the notion HARD

共享的多义模式 (Perrin 2007)

出“硬”之外还有诸多表示属性义的词，Perrin 据此构建了属性义的概念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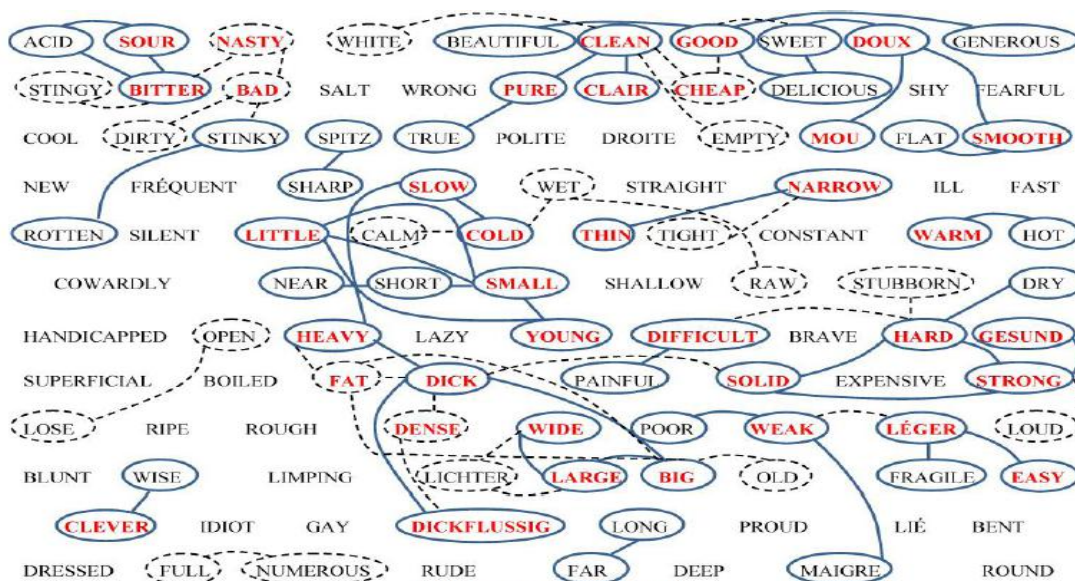


Figure 6: Conceptual map

Perrin 将“硬(hard)”义的多种意义之间的内部关系通过语义地图具象的呈现出来，这是语义地图应用于实词研究的一个典型尝试。除此之外还有学者绘制出“呼吸”义的语义地图（跨语言的勾连起“breathe”、“take a rest”、“be on vacation”、“cease to do”、“(wind) blow”、“(s.o.) blow”、“whisper”、“utter, speak”几个义项），“穿戴”动词的语义地图（以“穿”和“戴”的对象作为考察点，历时地勾勒出了汉语中穿戴动词的语义地图）（张定，2017），“给予”义动词的语义地图（饶春，2016）等等。不难看出，在绘制实词语义地图过程中选取节点的角度是最基本也最棘手的问题。

关于实词语义地图，Francois (2008) 还区分了共词化和同词化两个概念，他强调“词”的分析对象应该是意义而不是词，将功能上区分出来的意义以同样的词汇形式联系到一起的，这叫做“同词化”，Francois 据此提供了同词化语义地图的实际操作程序 (François(2008)指出，同词化语义地图的绘制是将两种语言中同样概念的词根据意义分类化后，共同语义联系在一起而完成的，他将语法类型学中 Haspelmath(2003)体系化的语义地图应用到语义类型学，按照本体特征，将意义分类到组合，将接近的意义联系起来，并通过实际验证而确定下来的意义

网络叫做语言外标准网络），并进而指出，词汇语义地图是在语言外标准网络上绘制出语言内部范畴化的，关键是查出语言之间的共性和个性。

### （三）视觉动词研究现状

关于视觉动词的研究非常丰富，不过绝大多数是从认知的角度、选取两种或多种语言中的相关视觉动词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尝试着解释两者之间的异同。朱元（2011）以英语和汉语的视觉词汇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比较了汉英中的视觉名词、视觉形容词以及视觉动词的语义引申状况的异同。其中，朱元对于“视觉动词”提供了较为精到的表述作以区分，这为界定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观点。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看见’义视觉动词”，这是为了能够更全面的概括不同类型语言中的同一情况：是动词，词义与“看见”有关，强调“看”的结果而非“看”的动作。因为各个语言中与“看”有关的视觉动词都非常多，以汉语为例，有“看”、“见”、“望”、“视”、“观”、“瞧”、“窥”，他们的意义侧重点细看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并不是要研究所有的视觉动词，而是各种语言中属于“看见”义视觉动词范畴中最原型的那个动词，这个动词一般而言使用频率非常高，在历时的语义演变或引申中一般最为活跃，所以同一个词条往往会包含多种义项，而调查这些义项之间的联系，并跳出汉语的框架从而融入屈折语、黏着语等语言类型的相关情况，进而尝试着构建出关于该特定词条在人类语言中具有普遍性的概念空间，绘制出各义项（节点）之间的关系的亲疏远近，能够帮助我们发掘“看见”义视觉动词在各语言中所表现出来的共性特征，从而为相关的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预测。同样重要的是，他也为我们提供了来自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语料和二者引申义项的初步比较分析。绘制语义地图不仅需要来自多个语言的语料支撑并对他们进行横向比较，还需要首先对各个语言内部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具体来说，我们还需要知晓各语言内部表示“看见”义的那个视觉动词是如何一步步引申出多种丰富的含义的，这个引申过程可能有哪些诱因，进而再比较不同语言的引申路径是否有何异同。这样进行最为稳妥，相对而言也比较细致，能够帮助我们把研究推向精细化。除此之外还有学者选择了韩语来作为汉语视觉动词的比较对象，如朴洪（2013），不过他并没有比较和分析相关视觉动词的引申义，而是另辟蹊径，比较了他们的附属义、句法分布以及语用情况。除此之外，对于视觉动词的研究散见于高校的学报上。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使用语义地图的工具来跨语言地构建核心视觉动词各义项之间的内部联系，已有的对视觉动词的分析集中在认知角度的探讨（吴新民，2006；张晓丽，2007；蒋宜轩，刘鸿，2012；胡伶俐，2013；胡伶俐，2016），对特定核心视觉动词或某类视觉动词（如动作类、心理类等）义项的来源、演变动因以及内部细分小类等方面进行探讨。不过这些讨论在帮助我们确定视觉动词历时义、共时义以及各义项关系上将会提供一些重要参考。

综上，本论文课题有如下研究意义：

- 1、使用语义地图这一分析工具再次整合视觉动词的语义网络，跨语言地构建出视觉动词的普遍概念空间，从中探讨挖掘语言共性；
- 2、根据语义地图的表征结果，可对前人从其他角度得出的相关研究结果做出验证；
- 3、在本次实词语义地图绘制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将给其他研究者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 [1]李小凡 张敏 郭锐等, 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2]吴福祥, 导语: 语义图模型与汉语语义研究[J]. 当代语言学, 2017 (4) .
- [3]潘秋平 张敏, 语义图模型与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研究[J]. 当代语言学, 2017 (4) .
- [4]饶春, “给予”义动词语义地图研究[J]. 现代语文, 2016.
- [5]范晓蕾, 语义地图的解析度及表征方式——以“能力义为核心的语义地图”为例[J]. 世界汉语教学, 2017 (2) .
- [6]范晓蕾, 以“许可—认识可能”之缺失论语义地图的形式和功能之细分——兼论情态类型系统之新界定[J]. 世界汉语教学, 2014 (1) .
- [7]李静波, 致使动词的语义地图[J]. 东北亚外语研究, 2017 (1) .
- [8]朱元, 汉英视觉动词语法化的认知分析[D]. 中央民族大学, 2006 博士论文.
- [9]朴洪, 《汉韩视觉动词对比》[D]. 延边大学, 2013 硕士论文.
- [10]吴新民, 汉英视觉动词概念隐喻的比较研究[J]. 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6 (29) .
- [11]张晓丽, 现代汉语视觉动词研究述评[J]. 语言理论研究, 2007.
- [12]蒋宜轩 刘鸿, 视觉动词的英汉认知语义对比[J]. 文学语言学研究, 2012(6).
- [13]胡伶俐, 国内视觉词汇隐喻研究综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 (22) .
- [14]胡伶俐, 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动词“see”多义认知解读[J]. 淮海工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14) .
- [15]Haspelmath M. 2003. The Geometry of Grammatical Meaning: Semantic Maps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In M. Tomasello(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vol. 2, pp. 211–243, New Yor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